

中国高层新智囊

影响中国进程的精英传记

历史研究出版社

目 录

汪道涵 两岸牌局中的“千王之王”	(1605)
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访华时要拜见的人	(1605)
老革命甘心让贤当人梯	(1606)
谷牧招贤纳士	(1607)
戳一下台湾半个地球都发痒	(1608)
汪道涵取消台湾之行	(1610)
汪道涵坐桌前，稳打“台湾牌”	(1611)
引述《波茨坦公告》居心堪疑	(1613)
台湾这张牌最不好打	(1615)
导弹打出新局面	(1618)
被外电称为有学者风度的人	(1619)
台湾之行再度取消	(1620)
大地震没有带来新转机	(1621)
面对台湾的“试探”气球	(1622)
汪道涵复印给中央办公厅三份材料	(1623)
称赞“曹青天”，汪道涵话外有话	(1643)
江泽民李鹏下定决心：打虎上山	(1645)
刘 吉 善借“风水”的改革急先锋	(1649)
奠基之作：《论决策科学化》	(1649)
弃工从文	(1650)
一石激起千层浪	(1652)
调进社科院	(1653)
借借玉泉山的风水	(1654)
把民主建设写进十五大报告的人	(1656)

【目 录】中国高层新智囊——影响中国进程的精英传记

我们这代人应该做什么	(1656)
吴敬琏 洗尽铅华走市场	(1659)
名门之后	(1660)
新中国第一代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	(1662)
良师益友	(1664)
锋芒乍现	(1666)
“市场理论”先锋	(1668)
经改理论的首席功臣	(1671)
何 新 向中南海致密札的“书斋战略家”	(1673)
大学不如自学	(1674)
“狂人”狂事	(1675)
预测苏联解体	(1677)
《谈话录》引发“何新旋风”	(1679)
就台湾问题提建议	(1681)
最先提出“过热论”遭围攻	(1682)
指出“经济增长率”有泡沫	(1683)
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敲警钟	(1685)
建议：中国粮换古巴糖	(1686)
提出对外开放新思路	(1688)
与托夫勒纵论世界大势	(1689)
就农业、粮食问题提出对策	(1692)
为国有企业号脉	(1696)
为金融改革诊病开方	(1698)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如何应对	(1710)
附录一 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几点看法	(1718)
附录二 世界未来的展望	(1727)
附录三 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	(1734)
附录四 警惕日本对华新战略	(1746)
附录五 访日研究报告	(1750)

附录六 1992 年就中美关系问题致邓小平的信 (摘要)	(1764)
厉以宁 共和国“股份”第一人	(1775)
冷落岁月	(1776)
曙色初霁	(1778)
后来居上	(1779)
深入民间	(1781)
寻找“例证”	(1783)
功成名就之后	(1784)
附录一 十论国事	(1785)
附录二 纵论整治市场经济秩序	(1789)
附录三 谈中国经济改革的四大重点	(1793)
胡鞍钢 敢向“特区”说“不”的国情专家	(1797)
敢向“特区”说“不”	(1797)
好学少年	(1799)
愿为贫困者鼓与呼	(1801)
第一号国情报告	(1802)
国情专家制定“削藩”计划	(1806)
胡鞍钢的“罪状”	(1808)
胡鞍钢之中国战略	(1810)
魏 杰 大个子“口力劳动者”	(1813)
为了生存而学习	(1814)
大个子的“小人物”时期	(1816)
自谓“口力劳动者”一族	(1818)
关于魏杰的是是非非	(1819)
大声疾呼反腐败	(1821)
为非国有经济鸣不平	(1823)
作为一个咨询者	(1824)
钟朋荣 善出奇招的京城红人	(1827)
让每一位倾听者都能理解	(1827)

【目 录】中国高层新智囊——影响中国进程的精英传记

生活 在社会底层	(1828)
从中南财大到中南海	(1830)
走出红墙	(1831)
商海本是多味海	(1833)
与经济学有天然缘分	(1835)
兴趣就是命运	(1837)
命运的转折	(1838)
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件事	(1840)
钟氏奇招：官逼民富	(1841)
曹思源 中国“破产法之父”	(1845)
“瓷都”作家	(1846)
考取于光远研究生	(1848)
往事与“雷区”	(1849)
六年调换四个单位	(1851)
没有学过法律的“中国破产法之父”	(1852)
“院外活动家”与民间智囊机构	(1856)
刘 伟 从“漂泊之子”到“命运宠儿”	(1859)
漂泊之子	(1860)
燕园骄子	(1862)
始为人师	(1865)
贤内助	(1867)
“客座”媒体	(1868)
作为经济学家的刘伟	(1870)
樊 纲 一匹惊世骇俗的经济学“黑马”	(1873)
从“农民”到经济学家	(1873)
要得到首先必须付出	(1874)
经济学理论自成一格	(1875)
新观念警世骇俗	(1876)
东亚金融危机为中国“免费”上课	(1877)

王沪宁 “一本政治学辞典”	(1879)
本想“躲进小楼成一统”	(1880)
无意去做外交官	(1882)
读书引发的婚姻悲喜剧	(1884)
大胆而有度的理论先锋	(1885)
对“特色理论”的贡献	(1887)
参与起草十三大报告	(1888)
闪电进京	(1889)
改革与稳定是王沪宁的研究核心	(1890)
关于“十二大关系”	(1892)
中国：政治学的时代	(1893)
人是政治的动物	(1894)
江总书记背诵《独立宣言》	(1896)
克林顿不懂王沪宁	(1897)
关于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理解	(1901)
附录 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	(1902)
萧灼基 燕园里的中国经济“预测家”	(1905)
一个“孤独”的南方人	(1905)
平生两大心愿	(1907)
改革开放闯禁区	(1909)
“以身试法”，消除社会上的“恐资病”	(1911)
“萧股市”谈股论金	(1913)
教育投入最保值	(1915)
被“困”人民大会堂	(1916)
龙永图 WTO 谈判桌上的“福将”	(1919)
遗失在“花溪”里的文学之梦	(1919)
联合国总部的中国外交官	(1921)
遭遇法国：一个人留在荒凉的“月球”上	(1924)
龙永图泪洒“入世”路	(1926)

【目 录】中国高层新智囊——影响中国进程的精英传记

中美角力：巴尔舍夫斯基遭遇“龙克星”	(1930)
附录 纽约高楼里的奢望	(1933)
辛 旗 为和平“博弈”	(1937)
“饿坏”的孩子	(1937)
棋迷：黑白间的角逐	(1938)
震惊学界的“中国圈”理论	(1941)
台湾一百天	(1943)
台湾人的悲哀就是中国人的悲哀	(1947)
陈水扁上台将是“爆炸性问题”	(1950)
危险的“多米诺骨牌阵”	(1952)
独必打，打必胜	(1953)
辛旗“旗”字上的九个字	(1955)
附录一 “全球化”之下的国际战略运势与两岸关系前景	(1956)
附录二 美国对台政策调整趋向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965)
附录三 论21世纪中国的安全环境与台湾问题	(1968)
童大林 打造中国城市“金项链”	(1975)
从“红小鬼”到“大阎王”	(1975)
陌生的中科院秘书长	(1977)
呼唤“人类之春”	(1980)
“东靠西移”构想惊动中南海	(1983)
作为邓小平的贴身智囊	(1985)
鼓吹“新亚欧大陆桥”	(1988)
小舞台转动大舞台	(1991)
体恤民众的“老百姓经济学”	(1993)
附录一 城市战略	(1995)
附录二 我们如何面对世界经济革命	(1998)
张汉林 重圆中国“入世梦”	(2003)
“口若悬河”的中国博士	(2003)
从“机械师”到国贸系研究生	(2005)

不出国门的“美国通”	(2007)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2008)
中国 WTO 研究会的核心人物	(2010)
反思谈判：以不变应万变	(2012)
一份让朱总理感到意外的报告	(2015)
附录一 我们为什么非“入世”不可	(2017)
附录二 细说“世贸”再论发展	(2021)
附录三 世贸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028)
唐树备 海协会“微笑天使”	(2031)
副部级官员的一个异数	(2031)
汪道涵看好唐树备	(2032)
为“汪辜会谈”穿梭两岸	(2034)
微笑中暗藏玄机	(2040)
唐树备声言：台湾主权超越中美关系	(2042)
张召忠 中国国防“高参”	(2045)
料事如神的“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	(2045)
“武器崇拜者”与“航母情结”	(2047)
面对海洋世纪的冲击	(2051)
打破李登辉的三个梦	(2055)
军事分析：中美无大战，但不可掉以轻心	(2058)
警惕“公海航行自由”的借口	(2063)
国防总动员	(2066)
附录一 “多极化”来临了吗	(2070)
附录二 网络未来战场	(2072)
林毅夫 中国农业经济学界的“台湾之子”	(2077)
亚洲企业年会上的大红人	(2077)
主持“中国农科优先序”研究	(2079)
与布朗谈粮食	(2081)
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2083)

附录一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	(2085)
附录二 深化市场改革是解决当前农民问题的	(2091)
盛 洪 为万世开太平	(2099)
一个在“误读”中成长的人	(2099)
心怀天下主义的民族主义者	(2101)
文明的冲突	(2104)
秦晖挑战盛洪	(2107)
盛洪再论“人类文明”与中国	(2108)
附录一 为万世开太平	(2112)
附录二 我们正处在一个战略性转折的历史关	(2122)
附录三 现代化就是现代人的创造力	(2124)
方 生 老来走红，一夜成名	(2135)
国民党通缉令里的第二号人物	(2135)
从台湾到大陆	(2136)
创办深圳大学	(2138)
一篇文章吹响新一轮改革号角	(2139)
两岸经济问题的专家	(2141)
方生与李登辉：同窗不同道	(2143)
反思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还不够	(2144)
附录 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	(2146)
董辅初 为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元老级人物	(2151)
漂泊	(2151)
武大骄子	(2152)
孙冶方遇见千里马	(2154)
成为孙冶方“八大干将”之一	(2156)
耸人听闻的“两个分离”	(2160)
希拉克要见董辅初	(2163)
“温州模式”的反思	(2165)
“三明治经济”“飞去来器经济”与“产业空洞化”	(2167)

从在美国的奇特经历看中国购物风险	(2171)
令人忧心的国企改革	(2173)
向吴敬琏叫板	(2176)
附录一 市场经济中防止官员腐败问题	(2179)
附录二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进一步研究	(2182)
附录三 非公有经济大发展机遇来临	(2185)

汪道涵

两岸牌局中的“千王之王”

汪道涵：两岸牌局中的千王之王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汪辜会谈”已经成为两岸沟通的一个代码。大陆的汪道涵，台湾的辜振甫，此二人肩上担负的分别是大陆人的渴望和宝岛人的企盼。“汪辜会谈”的成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两岸人民的喜怒哀乐，利益得失，其意义必然是历史性的。

翻阅世界各地的报纸，随便在哪一天的版面上，也许你都会触及类似这样的标题：《美国务院声明对汪辜会谈表示欢迎》（法新社华盛顿1998年10月9日电），《调查显示台多数人赞成两岸政治会谈》（美联社香港1998年10月7日电），《日报说辜振甫将巧妙利用京剧交流》（日本《产经新闻》1998年10月10日报道），《台媒体盼汪辜会晤有利保障台商利益》（中央社高雄1998年10月10日电），《辜振甫抛出创意风向球》（《中央日报》1999年10月16日评论），……。多年以来，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已经成为媒体上一个极为敏感的名字。汪道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不是1996年7月初，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雷克的一次大陆之行，人们对这个问题也许仍然不会深究。



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访华时要拜见的人

1996年7月初，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雷克在访华行程中，特意安排了一项赴上海会见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的内容。当这一消息由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之后，台湾朝野极为震惊。台湾方面认为，雷克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对台湾的出卖。须知，海协会只不过是便于海峡两岸有个初级的沟通渠道而建立的，没有太

【汪道涵】两岸牌局中的“千王之王”

大的理由与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举行平等的会谈，美国方面如此抬举海协会，台湾方面自然感到屈辱和不平。也正由此，才引起人们对汪道涵本身的兴趣：难道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汪道涵何许人？他与中国政权关系如何？一时间，海外报纸沸沸扬扬，各种说法纷至沓来。香港方面有消息说，汪道涵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与雷克扮演着相同的角色，是在中共内部掌握实权的人。美国方面的反华媒体更是多方挖掘信息，妄加评说，他们虽不敢否认知识分子出身的汪道涵的才识和能力，也不敢忽略曾长期主持过外经、外贸工作的功绩，却还是恶意中伤，认为这是在取消干部终身制后，给他一个几乎可以“终身”问政并且可以长期公开露面的具体名份。海协会会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这是一阶梯子，两岸的大人物必须有这架梯子才可能走到一起。不言而喻，其作用和历史意义是非凡的。



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因其祖籍是安徽，与汪道涵算是大同乡，所以，外电才有了一些子虚乌有的歪曲报道。

1985年，江泽民上海市长之职，是从汪道涵手中接任的。汪道涵不仅自己甘心让贤，而且还大力举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固然存在少数的贪官贪权的现象，但那些只是极个别的心术不正的人。大多数的党的领导都能做到让贤让位，做下一代的人梯。让我们举三个最有名的老人做例子，来做一个有力的证明。第一个例子就是刚刚讲过的汪道涵。第二个则是刘澜涛，他在任中国电力部部长时，首先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甘心让位并大力举荐年轻的部下李鹏，这一壮举为共和国培养了一位年轻的总理。第三个是李一氓，他也是慧眼识英才，发现了自己部下乔石的为人端正，生活廉洁，以及精明能干，有着非凡的魄力和领导才华，于是也甘心让贤。

这三位老人的义举给“八九风波”之后动荡的共和国培养了第一、第二、第三把手，就连美国最挑剔的政治家，也说这三位老人是共和国的三大伯乐。

这些老革命们的甘心让贤当然不是只凭几年的工作关系及上级对下级的了解。

了解一个人就要先了解他的历史，知人善任，这才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任。外电在议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时，都不能从这一角度入手，往往以偏盖全，是不能以理服人的。



汪道涵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抗战开始后，在安徽省任职。五十年代初，大批华东系统干部被充实到北京政要部门，汪道涵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文革结束后，我国一方面进行政治方面的整顿和改革，一方面着手抓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上，首先是搞改革开放，这就需要党的专家领导层亲自指挥并亲自上阵。所以，文革结束后，方毅被任命主持科技领导工作，而谷牧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全国对外开放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方毅是谷牧的得力干将，作为华东系统领导人出身的谷牧也曾经间接领导过汪道涵，对汪道涵也很赏识。这种赏识其实是很有根据的。建国后谷牧长期担任国家基建委、国家经委的领导工作，与一机部的负责人汪道涵自然有所接触，对汪道涵的能力和才干也是耳闻目睹的。

1979年7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局和外国投资管理局正式组建，谷牧亲自担任此两局的主任及党委书记，这是需要补充人力物力的时候，谷牧通过组织程序任用了汪道涵，让他做自己的副手——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

改革开放之初，一切都要非常谨慎地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专门发出一份通知，其中规定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发展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利用外资以及对外组织合作的方针政策。制订全国进出口、技术引进、经济合作、外汇收支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检查督促计划的实施。组织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组织制订实施条例和有关管理办法。组织有关部门审批合资企业的协议、合同和章程。统筹管理各部门、各地方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和进口设备工作，审议中国和外国政府间的长期经济合作或长期经济贸易协定、协议等等。

通知中还要求：此两个委员会及其党组，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当时国务院的相关部级机构，包括外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国家进口商品检验总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总而言之，所有与对外开放有关的事项，都由这两个委员会统揽。由此可见，谷牧领导的这两个管理委员会管理的范围之阔，任务之繁重。

任人唯贤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一贯作风。上面说的这两个委员会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极为重要的领导机构，自然需要招贤纳士。



对台政策是一个敏感问题，它一动就牵扯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甚至中澳关系。

由于两岸交流的困难，双方政府往往存在着对基本政策的误解。曾经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到台湾进行私人访问时曾强调：中国大陆虽然由于对台工作人员的人事更替而引起许多误解，但大陆的对台政策是基本不变的，局部的小的调整也是为了更加有利于两岸统一，而台湾不应怀疑大陆稍有用词不同便是要动武。

但说归说，台湾方面动不动就心怀芥蒂。新“八条”出台后，台湾方面就怀疑大陆是态度强硬了，要动武了，并由此而引起了不小的政坛骚乱。其实，这也正是汪道涵所期望的，目的是要警告一小部分“台独”分子，妄想分裂祖国是决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新的“八条”其实是非常宽容和友好的，但台湾方面负责大陆事务的官员智商却很低，他们不可能了解我党决策层的内幕，因此就出现猜测、琢磨、甚至主观臆断。据台湾方面的消息说，台湾的大陆事务官员常挨上司的骂，尽管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没有一次是让“头”满意的。

对此，台湾方面曾制造出许多谣言，中央社高雄方面曾传出议论，说中共的政权缺乏透明度，中共的官员都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去制定政策等等。其实很少理解，

他们因为自己不理解大陆的特点而对我党横加指责，其实更加证明了他们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和政治宽容。

汪道涵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也正因此，中央才对他委以重任，并在台湾事务上认真听取他的意见。“美国之音”曾在95年下半年经常就“汪辜会谈”发表怪论，并声称某某观点是汪道涵的个人主张，与中央的意见并不一致等等。在新的“八条”出台之后，更是认定此乃汪道涵为使第三代领导核心标新立异而抛出的新政，干脆叫之为“江八条”，说这一切都是汪道涵在背后操纵所致。其实无论从哪看，“新八条”都比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等笼统的说法更为具体、详细，而且充满着政治上的宽容和主动。最后一条被美联社的新闻称为“居高临下”的气势，并由此断定，第三代领导是比第二代领导更成熟、更自信的一代领导集体，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江八条”。

有一段路透社的消息是这样描述的：台湾方面若想在中共对台政策、特别是“动武底线”这样的关键问题上避免判断失误，最好的、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随时注意汪道涵的谈话内容，或者是找机会直接从他的嘴里套出话来。这样不仅仅是因为汪道涵目前还担任着大陆海协会会长长的职位，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当代领导人在两岸关系走向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全世界的新闻机构都开始注意汪道涵个人，而非真正的“汪辜会谈”本身。这一切正是新闻机构的通病：挖新闻、找隐私、发怪论。这一切商业操作背后，真实的东西到底又有多少呢？

汪道涵的助手唐树备在诠释“八条”及中共对台新政时，非常谨慎地用了一些官方话语，这一点与所有国家的新闻发言人没有什么区别。而汪道涵本身并非发言人的角色，他是大陆的海协会会长，所以，他在解释对台新政时就有着比较具体的内容，这也是他的权限所在。但是，这一点也被好奇的新闻传媒称作“代主发言”，是“帝师”行为，真让人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本来，对台新政在1995年春节抛出之后，引起的效果是非常热烈的。在台湾的工商界、爱国人士中间，大家一致认可“新政”的真诚和善意以及渴望两岸团聚的心情。一时间，受“新政”的鼓励，许多台湾工商界人士到大陆投资、观光，许多民间社团和爱国组织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新政”的提议，并督促台湾当局立刻作出回应，推行两岸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政府开始紧张起来。他先是沉默，接着是跑到美国去求援，回来后又大唱反调，致使又一次两岸接近的机会给丧失掉。美联社对此也有些看不过了，他们讽刺李登辉甘愿给美国当棋子，而冷淡自己祖国亲人的呼唤。“看起来，李登辉政府比起江泽民的核心来，不知要弱多少倍。”美联社在当年的一则新闻里如此说。

为了表示对李登辉政府唱反调行为的厌恶，经中央研究，汪道涵取消了原已定好的台湾之行。并且，引发出了我军的导弹演习。

本来，那是一个绝对的良机。无论是对大陆还是对台湾。但由于李登辉政府的倒行逆使，使汪道涵取消了台湾之行。不仅如此，使可能使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原订分别在北京和台湾举行的“汪辜会谈”成为了一句空话。

历史不会原谅罪人，中国人民也不会原谅李登辉政府的这一背弃民心之举。无论如何，历史和正义都不会忘记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日子。

在那样一段时间内，由于李登辉的不合作，导致了可能的两岸关系正常化又化为泡影。在此期间，《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许多篇鲜明的文章，声明我党、我军的统一观点，并且警告台湾方面，如果一意孤行，将自食恶果。这些说法比《人民日报》上的还要强硬，以至于外界怀疑“江泽民、李鹏、汪道涵又在玩什么花招？”

这段时间，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日子。从张爱萍、叶飞到杨成武、洪学智，这么一大批老将军无一不对台湾政府的卖国行为感到愤慨，他们有的撰文，有的集会发表演说，坚决反对李登辉政府的无耻态度，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李登辉就是“台独分子”，如果他不改变主张，将自食其果。

1995年8月，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张爱萍将军在《解放军报》